

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1]

——一个案例研究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旨在对英村的案例研究来揭示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改革以来英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市场化的集体制度, 而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 政治文化; 制度变迁; 农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 是国内外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的理论问题。在这一问题上, 以往主要有两种分析范式: 一种是“理性选择”范式, 强调外部制度结构变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 另一种可以称为“地方文化”范式, 强调村落文化、家族文化、人际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地方文化因素在社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影响。很显然, 两种分析范式都严重低估了国家主流政治文化在社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影响。有鉴于此, 本文将以英村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为经验题材做一个案例研究, 以透视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微妙而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反市场化的集体化

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里首先对英村制度变迁的基本过程和制度概貌做一个简略的介绍。英村是位于我国中南某地的一个行政村。总的来看, 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 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而是村党支部书记文林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英村进行体制改造的结果。

文林在改革前即担任英村的书记。1981年, 在农村改革大潮中, 英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 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集体解散后, 英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 效益急剧下滑, 工资拖欠严重, 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 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文林受贿造成的, 于是不断上访、告状, 搞得文林声名狼藉。1984年, 文林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 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 英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 文林也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 逐步对英村进行体制改造。

文林用以改造杰村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的“外圆内方”。所谓“外圆”, 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 按市场原则办事; 所谓“内方”, 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内方”的核心内容, 可以概括为两条: 一是“政治挂帅”, 二是“破私立公”。在“外圆”与“内方”之间, 是“内方”高于“外圆”, “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 “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是杰村制度变迁的根本导向和直接动力。

文林认为，“共产主义信仰”是英村发展的根本保障和动力。只要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一切工作就都好办了。因此，必须坚持“政治挂帅”的原则，把培养把“共产主义信仰”作为杰村的中心工作。文林进一步认为，“公心”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核心和本质。要培养和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就必须“破私立公”。“破私立公”的手段有二：一是大搞思想政治工作和“阶级斗争”；二是不断提高公有制程度，同时限制私有制的发展，从所有制上“斩断私心”。根据英村的说法，“内方”的所有理论都来源于“毛泽东思想”。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英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

英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文林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 20 余人组成，但文林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文林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一手独断。

在经济方面，英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英村下属的 26 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英村制度的“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英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英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豹。英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 23 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 25 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匪夷所思，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将杰村这样完全反市场化的集体化却未见报道过。尽管以前戴慕珍（J.C.Oi）、魏昂德（A.Walder）、林南（Nan Lin）等学者都强调中国改革进程的制度变迁有多种可能的方向和途径，但这种反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方向却仍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英村这种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色，其成因非常复杂。这里限于篇幅，只讨论它为什么要坚持“政治挂帅”、“破私立私”的指导思想。如前所述，这一指导思想直接决定了英村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和路径。我们不免要问：在整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已从“政治挂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因此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大力发展之际，英村何以仍要坚持“政治挂帅”、“破私立公”？又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是以往任何理论模型都未曾注意、未曾回答的。而正是这个难解之谜，体现了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二、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英村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与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 1956 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 20 余年。在这 20 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

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狠批私字一闪念”，去打击那些“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不良分子”。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济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础”，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 20 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英村党委书记文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文林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 60 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 60 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 64 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小。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 50 多户人家 200 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文林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 年 10 月份英村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 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 年又当生产队长。在 71 年的 10 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 74 年的 2 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 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 DW 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英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英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 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文林。我入党是 76 年 7 月 1 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英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文林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英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 75、76、77 这三年里我在 L 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文林。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文林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2]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一生也这走社会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 L 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关于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前已述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英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这些观念所从何来？不难推知，它来自文林人生早期这一段特殊的政治社会化经历。文林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后有关政治观念在英村的复活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三、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政治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延续。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英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英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

原因在于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刻，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自然会延续下来。英村就属于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文林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文林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其他条件因缘际合，使文林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进一步上升为整个英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文林也一样。在英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的讨论。这虽然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团结，但确实为旧的意识形态的延续留下了后门。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文林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承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以上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成为杰村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杰村的初始制度选择。

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文林等一班村干部克服了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选择了积极的作为而不是消极的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3]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从这个角度来看，村社区制度变迁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会更为严重。正因为如此，从全国来看，对于集体事业，多数村干部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专横跋扈，真正积极作为只是极少数。而文林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文林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

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LY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文林，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文林。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英村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 84 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 84 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文林认为）英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英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所以，在当时英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英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4]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

一是，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文林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文林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文林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文林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亦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文林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英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二是，在“集体承包”之后，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

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英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文林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四、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英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英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是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英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重新被树立为典型的。

前已述及，文林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英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很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文林又被有关部门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英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文林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英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英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文林虽然在英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文林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文林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话说英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一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文林和英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英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上级领导视察英村，并充分肯定了英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英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英村的高潮，以前对英村的种种怀疑和攻击刹那间变得不堪一击了。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英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英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英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同样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英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英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文林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文林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文林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文林开始改变自己和英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颠倒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英村后的第二年，文林就改变以前自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5]“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6]1992年，也是就有关部门全面“英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英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文林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再分配体制。

英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渐进改革条件下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英村来说，成为“典型”绝不仅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是同时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英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英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英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英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英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英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万元，到1998年，英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英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文林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7]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英

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英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使英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英村在社区发展所需要的大多数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英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英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英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英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文林塑造成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文林在制度选择的方向和政治实施的手段上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英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文林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安排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五、结论

英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的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当地人”（native）。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关注塑造这一动机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关注作为主导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参考文献

[1]文中所用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

[2]“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英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英村档案第52卷。

[3]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4]“文林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英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5]文林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英村档案第21卷

[6]“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英村档案第28卷。

[7]“文林在L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的发言”，英村档案第41卷。

Change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Choice of Community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Feng Shizhe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for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oice of community institutions and change of the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by referring to the case of Yingcun Village. Study shows tha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anti-market collective institution has formed in Yingcun in the background of reform of market economy, and such a unique orientation and path of change in institution is just brought about by the repeated remolding and constructing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culture. The paper displays the complicated and subtle logic and mechanism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is course.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institution transition; rural community

收稿日期: 2004-04-21;

作者简介: 冯仕政 (1974-), 社会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